

以“寒士家风” 授子女“自立之道”

“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，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。”梁启超在给子女的家书中，这句饱含期许的嘱托，道尽了一位父亲对子女最本质的关怀——他不追求为子女留下万贯家产，只愿“寒士家风”能成为子女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父亲的“反哺式”教育

梁启超对“寒士家风”的坚守，始终带着对自身成长经历的回望与对子女未来的考量。他出身贫寒，深知“寒士”身上那股“勤俭持家、勤学不辍”的韧劲有多珍贵；而当他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成为高收入群体时，反而愈发警惕：“使汝辈再处如前数年之境遇者，更阅数年，几何不变纨绔子哉！”这份担忧，让他坚定了以“寒士家风”教育子女的决心。

但梁启超所说的“寒士之家庭”绝非刻意追求生活的寒酸，而是要让子女承袭寒士的精神品格。他曾在信中嘱咐长女思顺：“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，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”，因为他清楚，“生当乱世，要吃得苦，才能站得住”——乱世之中，物质财富转瞬即逝，唯有勤俭、坚韧的“寒士精神”，才能成为子女抵御风浪的“铠甲”。

这种“以自身经历反哺子女教育”的觉醒，跳出了“为子女积财”的传统误区，直指教育的核心：培养能独立立足的人。

“严”与“爱”的教育平衡

提起“寒士”教育，很多人觉得严苛，但梁启超的教育中，却处处可见“严”与“爱”的平衡。他的“严”，体现在对子女精神品格的严格要求；而“爱”，则藏在对子女困境的理解与引导里。

思顺在国外生活陷入困境，写信向父亲倾诉时，梁启超没有一味安慰或立刻提供物质援助，而是先以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”引导她调整心态，再肯定“只要不至冻馁，在这种半清静半热闹的地方，带着孩子们读书最好”，最后温和地建议“几个孙子叫他们尝尝寒素风味，实属有益”。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，只有设身处地的理解。他还告诉思顺：“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，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。至于快乐与否，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。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，才真是会打算盘哩。”寥寥数语，将“吃苦”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智慧，消解了困境的沉重感。

更难得的是，梁启超的“严”从不只针对子女，更严于律己。1912年，他在信中反思自己：“因念频年佚乐太过，致此形骸，习于便安，不堪外境之剧变，此吾学养不足之证明也。”他还对比道：“更念吾友受吾指挥效命于疆场者，其苦不知加我几十倍，我在此已太安适耳。”这种自我警醒，让“寒士精神”不再是对子女的单向要求，而是整个家族共同遵守的准则，也让子女更易信服与践行。

子女的“自立”答卷

梁启超的“寒士家风”教育，最终在子女的人生答卷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。他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许，用“自立”书写了各自的精彩人生，而这份“自立”，正是“寒士之家庭”培育出的核心能力。

抗战时期，梁思成与林徽因被困四川李庄，彼时“梁思成和林徽因都身患重病，梁思成除了照顾妻子和弟弟，还要为营造学社筹集钱款”，可即便如此困顿，他们仍坚持古建筑研究，在抗战大后方留下了珍贵的学术成果——这份“在困苦中坚守”的韧性，正是梁启超“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”的生动实践。

父亲去世后，梁思礼出国留学时“随身所带的400美元，买完船票只剩100美元”，且“抗战八年断了和家里的联系”，可他凭借“寒士家风”练就的自强，靠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，最终成为导弹系统控制专家。而梁思宁则在目睹日军暴行后，放弃优渥生活，“南下参加新四军，投入到抗战的最前线”，这份家国担当的勇气，亦根植于父亲“寒士家风”中对精神品格的培育。

他们从未依赖“梁启超之子”的光环，而是靠着“寒士家风”赋予的坚韧、自强与担当，在各自领域站稳脚跟，用人生答卷回应了父亲的期许。

结语

百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重读梁启超的家书，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深沉的父爱与清醒的教育智慧。“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”，从来不是父亲的“狠心”，而是他能给予子女的最珍贵的礼物——因为他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为子女遮风挡雨，而是教会他们在风雨中自己撑伞；真正的教育不是给予物质满足，而是赋予他们自立于世的能力与品格。

END

参考文献|刘荣荣.“梁启超家书”思想研究[D].鲁东大学,2021.

文字|刘凯莉

初审|黄艺炫 黄金凤 李鹭

终审|周颖